

●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李 少 军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少军(1958-),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 要] 《新语探源》是从文化史角度对近代汉字新术语生成问题作全面考察的国内第一部较大型著述。它从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揭示汉字新术语生成之源, 凸显出汉字文化在中国、日本近代文化转型中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日源汉字新语的形成、入华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推进了相关研究; 在中国近代重要概念的由来、形成问题上也有可贵的创获。

[关键词] 《新语探源》; 近代汉字新术语; 中国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737-04

自100年前学界开始高度关注“新学语之输入”这一“最著之现象”以来, 国内外语言学、科技史工作者和专家为汉字新术语的搜集编纂、源流考辨、语义诠释等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身在中、西、日区域的学者专家分别深入挖掘资料, 从不同的视角考察, 展开了有形、无形的国际合作, 为研究提供了更为丰沛的资源 and 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而将这一问题置于文化史场域内观照, 联系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社会变迁来探求汉字词语沿革的机制, 并借以透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 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取向。就中国文化史领域而言, 在20、21世纪之交, 围绕中外文化关系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 研究者也在宏观叙述和论析的基础上, 开始转向对相关重要事项作专门、深入的研究。这样, 顺应学界新的发展趋势, 充分借鉴、吸收以往语言学、科技史领域的研究成果, 从文化史的视角对汉字新术语的生成进行较系统的考察,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冯天瑜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等名著蜚声中国文化史领域, 同时一贯关注词语因革, 尤其是转型时代关键术语的变迁问题, 围绕利玛窦、徐光启创译数学术语, 以及“文化”、“文明”、“中华”、“元典”、“民主”、“民族”诸词词义的古今转换, 进行论析、考释, 为汉字新术语研究作了有效尝试和长期准备, 并受到学界重视。1998年后, 冯教授赴日本讲学、执教3年, 在汉字新术语生成的主要区域接触了更多资料, 充分了解了相关研究状况, 正式将此作为一个主攻方向确定下来。作为其研究成果之一的《“革命”、“共和”: 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被评价为开辟了从关键词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路数。其后, 冯教授又潜心研究数年, 方有《新语探源》一书问世。

冯教授研究近代汉字新术语生成问题, 既有自身的深厚积累和特定角度, 同时也虚心学习和吸收了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其它兄弟学科之长。我们在《新语探源》中, 可以从多处看到对于各相关先导性材料的论列, 尤其是第五章, 以50000言篇幅集中介绍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充分体现出著者对前辈和时贤的尊重, 也使其著述颇具前沿性。

笔者认为, 《新语探源》作为从文化史角度对近代新术语生成问题作全面考察的国内第一部较大型

著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贡献:

第一,从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揭示汉字新术语生成之源,凸显出汉字文化在中国、日本近代文化转型中不可低估的作用。

提起近代汉字新术语,人们通常以“外来语”、“日源词汇”概之。而著者从“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因素也曾参与其间”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运用“思想及语言旅行”理论,从欧洲语汇随着西学东渐进入包括中日在内的汉字文化圈,中日两国在迎和拒之中各自形成新语积淀、又彼此借用新语的动态过程中,把握汉字新术语的形成之由。在这种视角下,近代汉字新术语之“源”是复合的,换言之,是东传的西方文化与中、日汉字文化在互动中共同创造了汉字新术语。读者由此可以认识到:古老的汉字文化在新的时代,面对西潮汹涌奔来,依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焕发出巨大创造力,成为文化转型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阐释汉字文化对于汉字新术语生成的重要影响,仅聚焦于各新术语形成之个案是无法做到充分、透辟的,还必须对汉字文化应对异文化传入、从中汲取营养并创制新语之内在的巨大潜力有足够认识和把握,而这正是著者作为文化史名家可以大显身手之处。因此,书中用较多篇幅对汉字文化本身展开论说,以其在古代的境内外传播、对日本的深广影响,来指明近代新术语生成之语言文字基础的预置;又通过对于汉字文化在古代“借词西域”、“吸纳印度佛教术语”的回顾,来展示汉字文化开放的胸襟;还专门联系佛典汉译,总结出西学东渐以前汉字文化已经确立的借词范式——音译、意译、音意合璧译。

著者重视明清以来西洋术语的汉译对佛典汉译范式的继承性,并强调中西文化在意义层面可以通约,汉字又具有表意文字的特性,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汉字新术语主要是通过意译西语而成。因此,著者考察徐光启、李之藻等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合译西书、厘定术语问题,便着重阐发其“意译”之法,即尽力从中国古典和常用语中寻找与西方术语内涵近似的名词,又对这些中国固有词语或加以引申发挥,或加以收缩定位,以逼近对应的西方术语的原有内涵,以求达到中西学术的沟通。著者认为,这种高度重视与汉字文化传统关联的“意译”之法,使其创制的汉字新术语广为流传,促进了西学传入。反之,无视汉字文化特性、在西语汉译中拒绝与中国固有词语发生联系的做法,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论及晚清的西书汉译,著者高度关注西方传教士围绕中西术语能否对译展开的争论,充分肯定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关于中国语言文字“随时逐渐生新”的信念,以及他与徐寿、华蘅芳等合作,不断在汉语中“设立新名”以对译西洋术语的实践,并以此对傅兰雅等树立起异语文意义沟通的丰碑、有力促进西学传入,作出了合理解释。

书中对“日源汉字新语”的考察,也相当有力地证明了汉字文化对其形成所起的基础性作用。著者根据史实指出:在日本近代,尽管不少知识精英乃至当政者不断发出限制使用乃至废止汉字之声,但汉字新词在日语中还是急剧增加,成为日语中新生词的主体、日本人介绍欧化事物和欧化思想的重要语文工具。书中介绍,日本人创制汉字新词,除了直接借用中国古典词之外,主要是根据汉字字义和造词法,参酌日语习惯,加以组合而成。这些内容可使读者认识到:正是长期形成的汉字文化根基,使日本具备了顺利吸收西学的文字条件,同时在创制新术语问题上,也得以避免遇到重大障碍。读者由此也不难想到,甲午战争后“日源汉字新语”大量入华并迅速融入汉语系统之中,更与汉字文化传统的有力支撑密不可分。

总之,《新语探源》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汉字文化对于近代汉字新术语形成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书中也不是无分别地礼赞本国文化,像明后期以迄于甲午战争前中国学界普遍漠视对西方语言文字的研习,导致所谓“西译中述”模式长期不变,严重削弱中国学人在新术语创制中的主动地位,终使日源汉字新语在汉字新术语中占了最大比重的问題,书中多处如实陈述,并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

第二,对日源汉字新语的形成、入华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推进了相关研究。

19、20世纪之交,汉字新语从日本大量涌入中国,且以“形而上”层面的语汇居多,由此对中国学术

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中日两国学界已推出了众多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已知的近代汉字新术语中判明属于日制词的部分并诠释其语意,或具体考察一些日制汉字新语的形成过程,对语意变迁加以仔细辨析。《新语探源》从文化史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人耳目的见解。

首先,书中阐述了日本创制、运用大量汉字新语的文化条件,即: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众多汉学根基深厚又具有西学新知的“双语译才”成长起来,成为创制汉字新语的主体;日本从中国陆续输入各种汉文西书,吸纳其中许多译词到其“国语语汇”当中,成为汉字新语的重要来源;汉字深深融入日本文化传统,又便于表现新事物、新概念,为日本人创制和推广新语提供了得心应手、十分有效的文字工具。

其次,探讨了近代日本借用汉语古典词汇、运用汉字造词法并参酌日语习惯对译西语、创制新词的问题。著者充分发挥稔熟中国古典文献的优势,对照、辨析一系列日制汉字新语与其所采借之汉语古典词汇各自的语义,将“借用”区分为“保留原意”、“引申新意”、“借形变义”三种情形。同时,著者全面考察古代与近代的“日制汉语”词汇,指出近代日本的“新汉语”大体上采用了汉语构词法,从形态到寓意方式都与汉字古典词无异,并据此对“日制汉语”词汇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后大多很快融化于汉字词汇之中,以至于中国人不觉其为外来语这种状况,作出了语言学的解释。

再次,从中日两国文化势位对比在近代发生逆转,入华“日本新名词”的数量和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波及面,中国人对日本新语入华的反应三个方面,论述了日本新语大量入华的动因,描绘了其入华的实际状貌,并揭示出其在华最终涵化于汉语词汇系统的归宿。其间,著者很好地做到了将其透辟的通讯与充分运用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语探源》从上述几个方面,推进了日源汉字新语的研究,也使之成为迄今为止在此问题上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著,对于关注这一问题的圈内外人士都会很有裨益。

第三,在中国近代重要概念的由来、形成问题上有可贵的创获。

著者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者,曾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概念史的研讨,故对于近代新术语生成的研究,自然也融入了其多年以来探求、覃思所得之创识。

作为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革命”、“共和”之形成和传播问题,以往学界并没有进行过专门、深入的研究。著者既对两者在中国的古典义进行深入发掘,又对近代日本人以“革命”对译 revolution、以“共和”对译 republic 的情况作了必要的考察,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两者作为日本汉字新语入华、与中国正在形成中的新的政治思想观念对接、又凭借政治变革消除阻碍而广为传播和定格的轨迹,由此展现出中国政治思想在社会矛盾促动下、受到古近中外思想文化因素多重影响而变化发展的斑斓画卷。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关于辛亥革命运动中孙中山究竟从何始开始用“革命”来表述自己政治主张的问题,以往多沿用出自陈少白回忆和冯自由记述的不确切说法,不免以讹传讹,而著者则通过在日本对原始资料的发掘、联系相关史实作实证研究,指出孙氏可能是在 1895 年底至 1896 年底之间、通过与日本友人宫崎弥藏兄弟交谈而开始以“革命党”自命。这一见解更加逼近历史真相,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

关于“文化”、“文明”这两个概念,著者揭示出它们在中—西—日之间的概念旅行过程,即:它们都有中国的古义,在近代分别由日本人、西方传教士用以对译 culture 和 civilization,到 19 世纪末,由跨出国门的先进中国人作为日本译词向国内推介,20 世纪 20 年代又由胡适等将二者明确加以区分。著者指出,经过中、西、日三边互动,原本含义模糊、宽泛的古典词“文化”、“文明”,升华为内涵深邃、丰富的中坚概念。

“科学”这个概念名词,人们一般认为纯粹是日本人为对译 science 而创制的,但著者指出它实际上也经历了在中、西、日之间的游徙:最初在中国南宋出现,含义为“分科举人之学”,后传入日本,在兰学接触欧洲自然科学诸学科后,被用以表述“分科之学”,到了近代,又正式成为 science 的对译词,并被赋予实证、分科的基本内涵。这一概念名词 1896 年由康有为从日本引入,以后逐步取代了“格致”、“赛因斯”,定格为 20 世纪初叶中国最具权威的概念之一。

应该说,著者对于“文化”“文明”“科学”的论述,不仅提示了它们从古至今作为概念转换的过程

给人以新的知识,而且为中、西、日文化互动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提供了颇富说服力的例证。

此外,著者对于一些原本在中国形成或接近现代义,输出日本后,近代又回归的“侨词”(如“地球”、“经纬线”、“回归线”、“物理”等)的论述,也颇有引人入胜之处。

著者十分重视以汉字词对译外来概念所应遵循的正轨,认为“经济”、“封建”、“形而上学”等术语既与中国古典义毫不搭界,又无法从汉字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有的甚至与所对应的西语词词义也不合,是中、西、日概念对接过程中发生的“畸变”,造成中外语文坐标系上的偏差。这些看法不失为一家之言,提出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综括《新语探源》的上述贡献,笔者认为,它堪称中国文化史研究之新的力作。

当然,笔者也不认为此书十全十美。书中关于一些历史背景、过程的叙述,笔墨略似嫌偏多。在结构上,前五章以对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历时性考察贯穿起来,而第六章则是对若干汉字新语进行个案考察,前后之间不够协调。第五章列出三类入华日本新名词,其中“汉语的词”一项及“日语的词”项下罗马字母所注日语读音,都有一些印刷错误。以上只是笔者一孔之见,未必都对,相信《新语探源》再版时会更臻完善。

(责任编辑 桂 莉)

Gratifying Harvest of Study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LI Shao-ju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Shao-jun (1958-),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bstract: “Xin Yu Tan Yuan” (*The Origins of New Words and Phrase*) is domestic first relatively large-scale book studying the question that the birth of new term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 all-round way and investigating in terms of culture history. It shows the source where the new te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duces by studying the inter dynamic culture among China, Western countries, Japan, and protruding incomparable function of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inese, Japanese modern culture transition. Have done comparatively overall combing to the forming, entering China of the new te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coming from Japan, have advanced relevant studying. It also has valuable achievement to the studying of the origin and forming process of important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Key words: “Xin Yu Tan Yuan” (*The Origins of New Words and Phrase*); new term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